

战时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 以西南联大为中心

王奇生

抗战时期，中国国民党在大学普设党部，将党的组织触角全面深入高等教育界。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在高校里建立了自己的地下组织。战时大学校园遂成为国共两党进行组织较量的一个重要舞台。数十年来，学术界对中共领导的学生运动史，已有相当细致的研究；相对而言，对执政的国民党在大学校园的组织活动情形，则缺乏深入翔实的探讨，甚至基本史实和大致轮廓也模糊不清。以西南联大为例，在已出的数本校史（包括北大、清华、南开）著作^①中，对于中共领导的爱国民主运动，均有专章详述，而对国民党与三青团在该校的组织活动，大都语焉不详，且或误述。过度的凸显与遮蔽，难免给人留下错误的印象和认知，以为大学校园是中共组织独自驰骋的舞台，而国民党则一味依靠军警特务实施武力镇压。其实，战时国共两党在大学校园中的斗争，多数情况下是“以组织对组织”的“文斗”。当组织较量不得力时，国民党才转而动用武力。以往对战时知识界与国

① 参见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萧超然等编著《北京大学校史》（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编著《清华大学校史稿》，中华书局，1981；南开大学校史编写组编《南开大学校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

民党关系的描述，偏重张扬战争后期少数倾向激进的大学教授和部分自由主义学者与执政当局之间的紧张和对立，有意无意地漠视和遮蔽了另外相当一部分与执政当局亲近合作的知识精英之心态与作为。直到最近，才有杨奎松、王晴佳等学者开始关注不同政治立场的大学教授在战后学潮中的分合与转化^①。不过，战时大学校园内的斗争，并不仅仅是国共两大政党之间的较量，国民党内不同派系亦以此为舞台展开角逐。学界分化的背后，尚有国民党派系纷争的因素潜存。此种分化与纷争甚至延续和影响了战后部分英美派学人与执政党的离心离德。抗战前后政治与学术互动之考察，若仅从国共相争立论，实难得真相之全貌。

本文在杨、王等学者既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战时知识界/教育界与执政党不同派系之间的复杂关系，侧重探讨国民党在大学校园中的组织活动情形。限于篇幅与资料，本文主要以国民党西南联大区党部为中心，兼及武汉大学、中山大学、西北大学等校党务。所用资料大部来自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所藏朱家骅档案。朱家骅（1893～1963）于1938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后出任中央党部秘书长兼中央调查统计局局长；三青团成立初期，一度兼任代理书记长；1939年11月至1944年5月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1944年11月转任教育部长。将党务带进校园是朱家骅主持国民党中央组织工作时的一项重要举措。朱家骅档案中藏有一大批战时大学党务档案，其中西南联大党、团负责人姚从吾与朱家骅之间数十封来往信函尤足珍贵。这些信函相当细致地呈现了战时西南联大国民党党务的运作情形。本文即以此为基础，兼及台北国民党党史馆和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的相关文献，通过西南联大这一个案，“再现”和展

^① 参见杨奎松《国民党在处理昆明学潮问题上的分歧》，《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5期；王晴佳《学潮与教授：抗战前后政治与学术互动的一个考察》，《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

示战时国民党在大学校园中的组织实态。至于三青团在联大的组织活动，本文仅兼带论及，其详细情形留待另文探讨。

一 大学党部的筹设

国民党的组织触角伸入大学校园，最早可追溯到 1920 年代国民革命时期。当时，在苏俄与中共的影响和推动下，国民党在青年学生中大力发展组织，吸纳党员。中央专门设立青年部，在部分大学和中学建立基层组织。“学生入党”一度成为时髦话题。^① 当时激进的青年学生对国民党的党化教育非但不反感，且以能接受党化教育和加入国民党为荣。

北伐胜利后，国民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路线政策亦相应改弦更张。国民党中央青年部与农民部、工人部、商民部、妇女部一起被取消。与此同时，国民党对青年学生参与政治的态度，渐由支持转向反对；对青年学生之加入国民党，亦由鼓励转为限制。战前国民党基本上没有在学校建立基层党组织。全国大学和专科学校中，可能只有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因其党校性质而设有区党部。一般院校未见设立。战前大学师生加入国民党者为数不多。

国民党在大学普设党部，是抗战时期的事。1939 年 3 月 14 日，蒋介石电令教育部长陈立夫：“全国各级学校有党籍之教职员，应设法管理，以考察并指导其行动与生活。”蒋并要求教育部和各省教育厅指定专人负责。陈立夫禀告蒋，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自 1938 年底即已着手在中央大学等 8 所高校中筹设党部。^②

① 参见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台北，中研院近史所专刊，1994，第 247～281 页。

② 李云汉主编、林养志编辑《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下），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93，第 11～12 页。

当时舆论认为，大学党部的筹设，主要缘于CC系向教育界扩张其势力地盘的考量。蒋介石欲加强对全国各级学校中国国民党籍教职员之组织管理，与CC系向教育界扩张势力的意图不谋而合。战前国民党党机器一直掌控在以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为首的CC系之手。1938年1月，陈立夫出任教育部长。在当时人们的揣测中，CC系势必趁此机会向教育界渗透。

另一方面，抗战初期新成立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积极在大中学校建立基层组织，亦刺激了CC系与之争夺地盘。CC系与复兴社（此处泛指包括复兴社与力行社在内的金字塔形组织）两大集团在战前即已展开过恶性的组织竞争。筹组三青团时，蒋介石将组织重任交付给了原复兴社成员，仅分配CC系在团内扮演适度调节的角色。由于复兴社势力实际主控了三青团，战前CC系与复兴社之间的派系宿怨，又延续为战时党团之间的对峙和竞争。^①教育界自然成为双方竞逐的重要场域。

党、团组织在西南联大的筹建，几乎是同时进行的。1939年7月，教育部长陈立夫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张厉生（CC系干将）联名致函西南联大三常委之一、北大校长蒋梦麟，要求在西南联大建立国民党直属区党部。与此同时，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姚从吾^②被三青团中央任命为西南联大三青团直属分团主任

① 参见王良卿《三民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国民党关系研究》，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8。

② 姚从吾（1894-1970），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科史学门，继任北大文科研究所国史学门为研究生；1922年12月赴德国留学，1934年夏返国受聘为北大历史系教授；抗战爆发后，随校南迁，任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1939年7月，任西南联大三青团直属分团筹备主任，负责组建该校三青团组织；1941年12月，任国民党西南联大直属区党部书记；1944年1月，西南联大区党部改选，连任区党部书记；1946年春，随北大返回北平，任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1947年7月，任河南大学校长；1949年去台湾，1958年当选为中研院院士。见《直属西南联大区党部人事组织动态报告》，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卷号：会5.3—225.12；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第634—635页。

干事，负责组建该校三青团组织。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最初规定，大学区党部由教职员党员与学生党员共同组织^①。陈立夫和张厉生在致蒋梦麟函中，亦请蒋推荐教职员党员2人、学生党员1人为西南联大区党部筹备员，负责西南联大区党部的筹备工作。对此，蒋梦麟表示担忧：“从前经验，校中党部不分员生。学生人数多，教职员人数少，几无发言余地，遑云指导？其弊则党内分派，抢权打架，骗中央津贴，诸奇百怪，直以党乱校。”为免蹈前辙，蒋梦麟主张大学党部的重心，必须放在教师身上。学生党员因学力经验不足，若无指导，则如无缰之马，必须置于教师党员的指导之下。他向陈、张建议：大学“区党部由教职员组织，学生则组织区分部，是则区党部直接受命令于中央，区分部则受命令于区党部，条理一贯，指挥如意矣。待组织全健后，再加入学生代表，方不至于闹向来之幼稚病。”^②

实际上，蒋梦麟的担心，并不全在教师党员与学生党员之间难以协调。他更为担心的是，由CC系主控的国民党党部，与由复兴社主控的三青团之间，在同一个校园中将如何共处。他将陈立夫与张厉生要求他在联大建立国民党区党部的消息，告诉了负责筹备西南联大三青团分部的姚从吾，并提醒姚说：“此事仍为两根线，一由二陈主持，一由黄埔主持（复兴社与黄埔系之间有历史渊源和人事传承关系，外间常将二者视为一体——引注）。此事合之则两美，离之则两伤。”^③

一般认为，战时国民党在高校里建立党部，是为了抑制中共

① 《关于各校区党部之筹设》，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卷号：特3—26.2。

② 《蒋梦麟复陈立夫、张厉生函》（1939年7月15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学校党务卷，卷号：95—（1）。下引各函，凡未标注出处者，均同此。

③ 《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39年7月16日、17日）。

扩张势力^①。这一说法在间接的意义上可以成立。不过，在最初筹设大学党部时，国民党党内派系的组织竞争，实为更直接的动因。

二 教师入党，学生入团

姚从吾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并留学德国，1934年返国受聘为北大历史系教授，抗战爆发后，随西南联大内迁。姚因与朱家骅有前后留德以及在北大求学、任教等“学缘”关系而深得朱家骅的信任。姚与朱同岁，但姚对朱执弟子礼，敬重有加。当朱家骅代理三青团书记长（1938年7月至1939年8月）时，姚被任命为联大三青团筹备主任。

姚从吾在筹备联大三青团之初，就建议朱家骅：教职员与学生应分别组织党部与团部。姚从吾认为，学生与教职员，年龄不同，地位不同，心理与见解亦各别。教授利害观念太重，不易组织，加之身家牵累，活气已竭；而青年学生，则英俊济济，思想活泼。因此他建议学校的政治组织应以学生为中心。教职员因“保守落后”只宜加入国民党，青年团则专吸收“思想进步”的学生；学校党部只可作为学校团部的辅佐和陪衬，不能妨害学生青年团的进行。^②

姚从吾重学生、轻教师，与前述蒋梦麟之重教师、轻学生的看法适相反。姚、蒋虽然都认为师生不宜混合编组，但两人的出发点大不同：在蒋看来，学生学力经验不足，好冲动，若无教师指导约束，则如无缰野马，故建议将学生党员置于教师党员的直接指导下，而不宜以“党内同志”的关系平起平坐。而姚从吾则

^① 胡国台：《抗战期间国共两党在高校里的斗争》，载《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9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② 《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39年7月16日、17日）。

认为教师老成保守，“大半”志在利禄，不宜吸纳到国民党体制中来，但他又替国民党担心：如果听任那些利害观念重的教职员徘徊于党国体制之外，又难免“别有怀抱”。姚从吾将希望寄托在青年学生身上。不过他也看到了青年学生情感胜于理智的一面，主张学生只许入团，不许入党；教师则只许入党，不许入团。

1939年11月，国民党中央常会第133次会议通过《党与团之关系及其实施办法》，其中规定：各级学校党部仅以教职员为对象，不得征收学生为党员；学生中之党员悉数介绍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在校学生，年龄虽满25岁，仍应入团；其已入党者，由中央党部令其加入团部，其党籍自仍保留。”^①1940年11月，国民党中央常会第163次会议又通过《确定党与团之关系办法》，再次重申各级学校党部不得征求学生入党，并划分党与团的活动范围：党的活动范围注重社会，团的活动范围注重青年学生^②。这样一来，从制度上明确划分了国民党与三青团在学校的组织发展对象和范围，改变了先前教师党员与学生党员混合编组学校党部的规定，与姚从吾的教师入党、学生入团之主张大致吻合。

战时各大学是否严格遵循了国民党中央有关教职员与学生分别入党、入团的规定呢？

由于缺乏全面、完整的统计资料，我们无法得知战时各大学党部党员构成的整体状况。据已掌握的数所大学区党部的相关数据显示，有的大学在吸收教职员入党的同时，仍然吸收学生入党。如西北大学区党部即发展了大量学生党员，只是在划编区分部时，教职员党员与学生党员分别编组^③。另据中山大学区党部

① 《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39年12月28日）。

② 《确定党与团之关系办法》，载《中央党务公报》第3卷第11期，1941年5月12日。

③ 《指示直属西北大学区党部工作》，载《中央党务公报》第3卷第1期，1941年1月10日。

1943年6月的党务报告，该校有党员1200多人^①，党员人数为全国大学之冠，其中多数是学生^②；而且区党部的职位亦全为学生把持，以至激起部分教职员党员的不满^③。

国立中正大学则声称遵守中央有关规定，“本区征求党员，仅以教职员为对象。”“凡学生中党员年龄未满25岁者，一律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拨归本校分团部暂行保留党籍。”^④武汉大学区党部最初是将教师党员与学生党员合编，后遵循国民党中央的规定，将教职员与学生分开组织：学生有三青团，教职员有党部；党部工作注重教职员，而以学生为辅^⑤。

西南联大的情形与中正大学、武汉大学相似。党员以教职员为主。教职员党员中，又以教授为主。1944年1月西南联大区党部召开党员大会，出席党员79人，请假6人，合计85人，其中教授42人，教员、教官、助教、研究生共25人，职员14人，学生4人^⑥。教授党员近占半数。据姚从吾写给朱家骅的报告，此时西南联大教师党员（不含职员与学生党员）合计实有150余人^⑦。

① 《任国荣致朱家骅函》（1943年6月20日），朱家骅档，学校党务卷，卷号：95—（5）。

② 《中国国民党直属国立中山大学区党部三十一年度工作大纲》，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号：717（4）—1065。

③ 《国立中山大学党员代表致重庆中央党部组织部长电》（1944年7月10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号：717（4）—1065。

④ 《中国国民党直属国立中正大学区党部三十一年度工作总报告》、《中国国民党直属国立中正大学区党部三十一年工作实施进度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号：717（4）—1063。

⑤ 《武汉大学区党部书记杨端六呈报本部去年下半年工作情形及今后工作计划由》（1941年1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号：717（4）—1077；《杨端六致朱家骅函》（1942年3月11日），朱家骅档，学校党务卷，卷号：94—（12）。

⑥ 《中央直属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区党部第三次党员大会（会议记录）》（1944年1月7日），朱家骅档，学校党务卷，卷号：95—（1）。

⑦ 《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44年2月12日）。

而是年西南联大教师总数为 371 人（兼任除外），其中教授 155 人^①。由此推断，西南联大教师大约 40% 加入了国民党^②。其中教授加入国民党的比例可能接近 50%。在号称战时“民主堡垒”的西南联大，这一比例实可惊人。

三 教授的入党情境

半数教授加入了国民党。这一事实，足以提示我们有必要重新检讨西南联大知识分子与执政当局之间的复杂关系。至少意味着，联大教授是一个多元分化的群体，其中既有闻一多那样的“民主斗士”，亦有姚从吾这样的“坚贞党员”。仅就人数而论，后者实际超过了前者。但无论前者还是后者，均是战时大学教授日趋政治化的重要表征。

西南联大的国民党籍教授，除少数在战前即已加入者外，多数是在联大时期新加入的。也有的是早期加入过国民党，后因长期不与国民党发生组织关系，实已无形脱党，战时又重新填表加入。联大教授加入国民党的情形比较复杂，不能对他们的人党动机一概而论。

率先加入国民党的，是担任学校及院系行政职务的一批教授。当陈立夫、张厉生要求蒋梦麟在西南联大建立国民党直属区党部后，蒋梦麟立即拟具计划：“第一步先介绍联大之各长之未入党者入党；第二步介绍北大清华南开各校原来之各长入党；第三步联大各系主任及三校原来之各系主任。如是则三校之健全主

① 《三十三年度第一学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员数报告简表》，北京大学等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四），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第379页。

② 姚从吾在1944年2月12日给朱家骅的一封信中谈到，联大教师党员（不含职员）约占教师总数的1/4。这一估计可能是姚对当时联大教师总数了解不准确所致。

要分子，大部分为党员，则以后推行党务，如顺水推舟矣。”^① 1939年7月23日，蒋梦麟召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院处以上教授举行茶会，宣布“凡在联大及三校负责人，其未加入国民党者，均先行加入”^②。会后不久，冯友兰等十余位担任行政职务的教授即首先加入。冯友兰在1924年冬曾一度加入过国民党，但入党后对参加实际革命活动缺乏兴趣和热情，到1926年便自行脱党。此次在联大重新入党，据冯友兰晚年的回忆，是重庆教育部有命令，大学院长以上的人都必须是国民党党员^③。事实上，重庆教育部的命令并非强制，也并非所有院系负责人都加入了国民党。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拒绝入党后，其职位并未受到影响。另如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多次拒绝加入国民党^④，亦未影响其职位。当时的实际情形是，联大各院系负责人对国民党的入党邀请，多数采取了合作而非对抗的态度。冯友兰当时虽然没有加入国民党的积极意愿，而且此前曾以学术与政治须分途为由，谢绝了朱家骅要他为三青团向青年作号召的请求^⑤。但他并没有拒绝蒋梦麟送来的国民党党证。这种合作而非对抗的态度，大体代表了战时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团结御侮”的大背景下对执掌政权的国民党之真实心态。尤其是抗战初期，多数知识界精英

① 《蒋梦麟复陈立夫、张厉生函》（1939年7月15日）。

② 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编著《清华大学校史稿》，中华书局，1981，第296—297页；蔡仲德著《冯友兰先生年谱长编》，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第239页。

③ 冯友兰著、蔡仲德编《我的学术之路——冯友兰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2000，第111页。

④ 竺可桢自1936年4月至1949年4月，一直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在任期间，曾于1938年5月和1939年3月两次拒绝加入国民党，但1943年4月出席三青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因被选为三青团中央监察委员，无奈之中加入了三青团；1944年8月才正式加入国民党，而此前全国大学校长中，只有他一人非国民党员。见《竺可桢日记》，人民出版社，1984，第1册，第234、316页；第2册，第673、680、775页。

⑤ 蔡仲德著《冯友兰先生年谱长编》，第244页。

将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加入国民党，在某种意义上也表示自己与执政当局共渡艰难一致对外的决心。即使如竺可桢那样“对入党事极不热心”，并对国民党的一些作为不愿苟同的人，亦表示“对国民党并不反对”^①。另据朱自清 1943 年 5 月 9 日日记载，罗常培给闻一多一份入党申请书，拉闻入党。闻有些动心，邀朱自清一同参加。朱以“未受到邀请”为由婉拒。受朱的影响，闻才打消了入党的念头。^② 据此观之，后来以“民主斗士”著称的闻一多，直到此际，对国民党尚无明显敌对情绪。若非朱自清劝阻，闻也许就加入了国民党。

除院系负责人外，有部分教授是因为私人情谊，或主动或被动地成为国民党体制中的一员。1939 年 11 月，朱家骅接替 CC 系干将张厉生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在此之前，蒋介石一直将党务交付给二陈（果夫、立夫）为首的 CC 系掌控。CC 系对党务资源的长期垄断，导致不少人因厌恶其派阀作风而不愿加入国民党。与陈立夫、张厉生等纯粹的“党官”有所不同，朱家骅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政学两栖人物。留学德国的学历背景，北京大学教授、中山大学副校长、中央大学校长等任职经历，以及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等显赫头衔及其所掌控的丰富的学术资源，使朱家骅在知识界具有深厚的人脉基础。正是与学界人物之千丝万缕的联系，朱家骅在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后，有意要将党务带进校园。在其直接笼络或间接影响下，相当一批知识精英相继加入国民党。在此之前，很多知识界人士对 CC 系控制的国民党敬而远之。而朱家骅接掌国民党组织大权后，很快成为执政党联络和亲近知识界的一个重要桥梁。

姚从吾原本是一个埋首书斋的纯粹学者。当朱家骅推荐其担任联大三青团负责人时，他列举多种理由表示“恳辞”。后得知

① 《竺可桢日记》第 2 册，第 768 页。

② 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 10 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第 240 页。

此事已由蒋介石批准发表，并出于对朱家骅这位师长的尊重，姚勉为其难地接受了。朱家骅转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后，姚也随之担任联大区党部书记。在此期间，姚逐渐对政治产生了“不感兴趣”的兴趣，并由一名“纯粹的”学者逐渐转化成为一名忠贞的国民党党员。姚担任联大区党部书记期间，又介绍身边的一批同事、朋友相继加入了国民党。罗常培、贺麟、雷海宗、华罗庚等人均是在姚从吾的动员和怂恿下，通过朱家骅亲自介绍加入的。姚向朱家骅坦承，在西南联大国民党组织发展过程中，私人情谊远胜过组织关系。姚从吾推荐给朱家骅的人，大多与朱家骅有一定的学缘关系，或留学德国，或北大出身，或中研院同事等。在近代中国知识界，相同或不同的留学背景，常常是影响他们相互聚合或疏离的重要因素。显然因为朱家骅的关系，西南联大留德出身的教授，大部被介绍加入了国民党。被介绍者中，有的对入党比较积极，有的虽不大情愿，但碍于朋友“面子”不便拒绝而勉强加入。如史学系主任雷海宗，与姚相交甚密。姚对其反复游说，雷仍有些犹疑。姚请朱家骅亲自出面邀雷入党，雷碍于情面方表示允可。^①

联大教授中，考量个人政治前途而加入者亦不乏人。姚从吾在私下里一再批评联大教授“大半”志在利禄，“利害观念太重”。他致信朱家骅说：联大教授“大抵学有专长，各有独见，均愿与政府及党国中枢要人私人发生关系，以言党务，则均事规避，故党务工作推行实难。”^②之所以如此，与国民党的组织体制大有关系。国民党虽然号称“以党治国”，但在人事任用和晋升时，党籍有无，实无关宏旨。对谋职谋位者而言，关键是有无奥援，有无私人背景。战时国民党发展党员，有几种不同途径：

① 《姚从吾、王信忠致朱家骅函》（1942年11月）；《朱家骅致雷海宗函》（1942年11月28日）；《雷海宗复朱家骅函》（1942年12月31日）。

② 《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42年2月10日）。

一是通过基层区分部介绍、吸收。这是正途。二是集体入党。军队士兵入党大多采取这一方式。三是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与各省市党部直接征求，特许入党。这一种方式主要面向知识精英和各界名流。通过朱家骅介绍特许入党，一则可以体现自己的特殊身份，二则可以藉机与介绍人建立私人交情。联大教授中那些想与“党国中枢要人”发生私人关系的人，亦希望藉由朱家骅介绍入党而与朱建立私谊，对国民党的“公”组织并无多大兴趣。为了迎合这种心理，姚从吾在介绍教授入党时，经常转请朱家骅亲自写信邀请；每当有党员教授赴重庆时，姚会函请朱家骅亲自接见他们，以示笼络。此种情形不止在联大，在其他大学也同样存在。如中山大学区党部书记任国荣在给朱家骅的信中写道：“区党部之执行委员会已无形解散，本可从新选举，但一般心理，皆极愿与钧长发生直接关系。故鄙见以为不如仍由中央选派。”^①任国荣所称的“一般心理”值得注意：大学区党部委员不愿自下而上地由党员选举产生，而极愿由中央自上而下地选派。所谓“中央选派”者，实际上由朱家骅选派。被选派者即多因此而与朱氏个人结缘，或进而成为“朱派”中的一员。朱家骅本人显然也乐意利用此种“一般心理”，以网罗人马，壮大自己的派系势力。就派系属性论，朱家骅原本与CC系较为亲近。但自其接掌中央组织部长后，开始自组班底，另树一帜。由于朱家骅在学界政界均有相当的地位与历史基础，自立门户后，很快成长为战时一大新生派系，并逐渐与CC系形成分庭抗礼之势。

联大教授中，还有一批主动申请加入者。在这方面，理工科教授尤多，如张文裕（物理）、孟昭英（无线电）、范绪筠（无线电）、赵九章（气象）、苏国桢（化工）、王德荣（航空工

① 《任国荣致朱家骅函》（1944年1月20日），朱家骅档，学校党务卷，卷号：95—（5）。

程)、闵嗣鹤(数学)、施惠同(数学)、叶楷(电机工程)、马大猷(电机工程)、李庆海(土木工程)、叶日葵、郑师拙等。他们之入党,多是华罗庚引介的。据华罗庚自述,他在北伐时期(1926)加入过国民党。北伐后,他因没有参加登记而自动脱党。1942年12月,华由朱家骅介绍重新入党。^①华罗庚入党后,其理科同事多人亦相率要求入党。华罗庚将他们一一引荐给朱家骅。^②华罗庚还致函朱家骅,主动请求赴重庆中央训练团受训。受训期间,他还专门就党团问题与党国要政,向朱家骅进言献策。据姚从吾称,华在入党之前,曾上书蒋介石,“条陈青年问题,颇蒙奖许”^③。1945年5月,国民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选举新一届中央委员时,朱家骅签呈总裁蒋介石,将华罗庚列为中央委员候选人。华罗庚虽然最终未能当选,但对朱家骅“感深铭腑,莫可言宣”^④。

华罗庚的情形在联大理工科教授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们并非完全沉潜书斋,不问政事。至少在抗战时期,他们中不少人对国民党实际抱有相当的同情和支持。

四 联大区党部的组织运作

如果说,大学党部的最初筹设,在相当程度上缘于CC系向教育界扩张势力的考虑,那么,自朱家骅接掌组织部后,学校党务乃正式成为战时国民党组织建设的重要一环,而统制教师和学生

① 《华罗庚致朱家骅函》(1942年12月19日),朱家骅档,人才人事卷,卷号:459—(2)。

② 《华罗庚致朱家骅函》(1943年2月21日、3月4日、10月12日、1944年1月8日),朱家骅档,人才人事卷,卷号:459—(2)。

③ 《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42年11月28日)。

④ 《华罗庚致朱家骅函》(1945年6月26日),朱家骅档,人才人事卷,卷号:459—(2)。

生的思想信仰与组织纪律，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学校党务的主要目标。朱家骅认为，党不是一个孤立的集团，党必须社会化，尤其要和教育界、文化界沟通，因为中国的社会结构仍然是士人社会而不是工业社会，党若和文化教育界脱节，则这个党将完全没有社会基础。因此，他主张党要开门，让教育界的人进来；同时也要使大学开门，让党的力量进去，从而使党教趋于一致。^①

依据1938年12月国民党中央常会第106次会议通过的《筹设各专科以上学校及国立中学直属区党部组织办法》，凡各专科以上学校及国立中学应按照情形，分别设置直属区党部；一般情况下，国立、私立专科以上学校区党部直属中央党部；省立专科以上学校及国立中学区党部直属所在地之省市党部^②。战时各大学党部的筹建，多在1939年下半年至1940年上半年之间。西南联大直属区党部的筹备和成立情形，以往相关论著之记载大多不确。实际情形是：1939年10月，国民党第五届中常会第132次会议议决设立西南联大直属区党部，任命钱端升、周炳琳、查良钊三位教授为联大区党部筹备员。联大区党部的筹备工作，开始于1940年初。^③联大区党部在筹备期间，除了发展一批新党员外，党务活动甚少。经过了大约一年半的筹备，联大国民党于1941年7月23日召开全校党员大会，选举产生第一届执监委员，宣告区党部正式成立。周炳琳、姚从吾、钱端升、田培林、冯友兰、查良钊、王信忠等7人为执行委员，杨西昆、黄钰生为候补执行委员，蒋梦麟为监察委员，梅贻琦为候补监察委员。联大区党部正式成立后，正值暑假，加之敌机空袭，新当选的执监

① 甘家馨：《给国民党带来新观念新作风的朱先生》，台北《传记文学》第29卷第6期，1976年12月，第22~24页。

② 《筹设直属专科以上学校及国立中学区党部经过》，载《中央党务公报》第1卷第5期，1939年8月12日。

③ 《关于各校区党部之筹设》，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卷号：特3—26.1；《周炳琳致朱家骅函》（1939年12月18日）。

委离昆明者甚多，迟至同年12月23日才举行第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会议推选姚从吾为区党部书记。^①在此之前，姚已辞去联大三青团分团部筹备主任职务（由教育系教授陈雪屏接任）。

联大区党部内设组织、总务、宣传等股，由王信忠负责组织，杨西昆负责总务，查良钊负责宣传。区党部下按学院分设数个区分部，如文学院区分部、师范学院区分部、法商学院区分部等。^②据姚从吾称，联大党员教授对开会、服务等工作多不热心。日常党务工作主要由姚从吾等数位区党部执委推动。

1944年1月7日，联大区党部改选。新一届执行委员7人：姚从吾、周炳琳、陈雪屏、郑华炽、雷海宗、查良钊、钱端升。候补执委5人：杨石先、何鹏毓、孙毓棠、宋泽生、孙树本。蒋梦麟、梅贻琦仍分别为监委和候补监委。姚从吾继续担任联大区党部书记，另由何鹏毓负责总务，郑华炽负责组织，雷海宗负责学术兼宣传。^③

姚从吾担任联大区党部书记以后，以做一个国民党“忠实党员”为己任，立志于“授课之外，虚心办党，不赴重庆，不作官吏，期以三年，冀其有成”^④。姚从吾没有把联大区党部的工作重心放在积极对付中共和统制师生方面。因联大区党部主要以教师为对象，统制和强制只会适得其反。身为教授的姚从吾显然对此有充分的认识。在联大区党部筹备初期，“教授均以名列党籍为讳”^⑤，已入党者也多不愿公开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在

① 《直属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区党部呈报成立经过及工作分配情形》（1942年1月22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号：717（4）—1092。

② 《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42年1月21日、2月10日、4月6日）。

③ 《直属西南联大区党部人事组织动态报告》，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卷号：会5.3—225.12。

④ 《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43年2月20日）。

⑤ 《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42年8月10日）。

这种情况下，姚从吾借助朱家骅所掌控的丰厚学术资源和人脉关系，首先吸纳一批具有较高学术声望而又热心党务的教授入党，再通过这批有声望的教授党员，去吸引青年教师。姚从吾经过审慎的观察和考查，首先向朱家骅推荐了周炳琳、陈雪屏、贺麟、田培林、郑天挺等5位教授，认为这5位教授品学兼优、忠实、稳健、人缘佳，建议朱家骅对他们“信之任之”，以他们为骨干，再从清华、南开各选择若干人，形成一比较扩大的核心，“则党务在联大自有欣欣向荣之势”^①。5人中，除田培林被朱家骅于1941年冬调赴重庆，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训练处处长外，其他4人与姚从吾、查良钊、钱端升等人一起，成为西南联大开展国民党党务的中坚力量。

姚从吾在联大的办党方针是：“以学术领导党务”，“寓宣场主义于研究”，“党与学术配合，团与教育配合”^②，藉学术确立区党部在联大教师中的信用和地位。而举办学术讲座，是联大区党部开展“学术党务”之首途。数年间，联大区党部共计举办了一百多场次学术讲演^③。报告人以党籍教授为主，有时也邀请党外教授加入。讲座本身都是学术性的，没有明显“党化”意味。姚从吾坦承其举办学术讲座的目的，对学生重在安定人心，对教授重在“联络感情”^④。前者重精神，后者重物质。两者均收到了一定的成效。讲座的学术性，受到多数学生的欢迎，而对演讲者而言，“联络感情”的关键，实际上并不在“学术”，而在演讲报酬。1941年开始，昆明物价骤涨。二三百元讲演费，对演讲者不无小补。聚餐竟也成了笼络和凝聚人心的一个重要手段。姚从吾承认：“在联大数日不得一饱，忧困交迫情形中，有

① 《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41年6月2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号：717（4）—1092。

② 《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42年2月10日）。

③ 《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44年4月25日）。

④ 《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42年2月10日）。

此调剂影响实大。”^①

创办刊物，是联大区党部开展“学术党务”的另一手段。为了吸引联大青年助教入党，姚从吾最初设想创办一学术期刊。刊物拟名为《人文季刊》或《社会科学季刊》，由助教党员何炳棣、何鹏毓出面组织，但这一计划似未能落实。办得较有声色的是《当代评论》杂志。该刊于1941年7月创刊，1944年3月终刊。姚从吾声称该刊是云贵诸省唯一的政论周刊^②。“联大区党部年来人数之增加，工作之开展，得力于《当代评论》之号召者实多。”^③“党在联大一年来，似有若干信用，而一部分少壮教授之参加，《当代评论》之出版，实为主因。”^④笔者重新检视该刊，感觉其党化色彩甚淡。此点也许正是该刊之成功处。

推荐党员教授到重庆做官、到中央训练团受训和选拔应届毕业生到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工作，是联大区党部笼络党员人心的又一要着。一些年轻教师为出国做准备，未雨绸缪想争取到中央训练团受训。而联大区党部向国民党中央多争取几个受训指标，既“可以表现党在联大有力量、有计划、有办法”；又“可以鼓励联大教授中之少壮派”^⑤。至于选拔优秀青年学生到中央组织部任职，“可以引起大学优秀青年对党之欣慕，为效极大”^⑥。

姚从吾“以学术领导党务”的办党方针，在西南联大确实收到了相当的效果。他在担任区党部书记一年后自我总结说：一年前联大教授多以名列党籍为讳，今则自承为党员者日多，联大党务已引起各方之注意^⑦。1944年姚从吾第二次连任区党部书记

① 《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43年5月18日）。

② 《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43年2月20日）。

③ 《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44年2月12日）。

④ 《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42年6月3日）。

⑤ 《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42年6月3日）。

⑥ 《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42年9月21日）。

⑦ 《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42年8月10日）。

时，认为“党与团在联大信用已著”，“党在联大之基础，已大致稳定。”^①

在西南联大这所具有自由主义历史传承的高等学府，能吸纳1/2的教授加入国民党，确非易事。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的甘家馨后来回忆说：西南联大是战时最坚强的学校，党是很难进门的，但是朱家骅凭其个人在教育界的条件，居然把西南联大的人也拉进党里面来，在西南联大也能设立党部，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②。

五 联大区党部与学潮

中共在西南联大的地下支部成立于1939年3月^③，比联大国民党区党部和三青团分团部成立略早。三青团分团部成立后，联大学生自治会即受其掌控。而联大的中共地下支部十分隐蔽，初期几无公开活动。在1941年1月皖南事变以前，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两党在联大的基层组织大体相安无事。皖南事变以后，中共将大部分党员学生撤离联大，疏散到云南边境各县，留下的少数几个未暴露身份的学生党员也基本停止了活动。故在抗战前期，国共两党在联大校园内实际没有过正面交锋。

1943年春，中共地下党支部在西南联大重新建立。而自本年起，“联大青年团因复兴社旧人逐渐离校，政治性渐淡”^④。到1944年，学生自治会脱离三青团的掌控，转入左翼学生之手。三青团势力减弱后，联大校园的民主风气顿形活跃。一时间墙报如雨后春笋。联大区党部试图加以控制、引导和利用，如组织息

① 《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44年2月12日）。

② 甘家馨：《给国民党带来新观念新作风的朱先生》，台北《传记文学》第29卷第6期，1976年12月，第22-24页。

③ 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第438页。

④ 《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43年12月17日）。

谈会，酌予物质上经济上之协助等，但没有采取过激手段打压进步学生的活动。校园氛围尚属宽松。

1944年春，李公朴等人组织云南学术界宪政问题研究会。在姚从吾看来，李公朴等人“以研究宪政为掩护，以批评政府，实现私图为主旨”。联大区党部为了抑制其活动，乃先发制人，由钱端升、周炳琳两名党员教授以联大法学院宪政讲演会名义，邀请6名党员教授、4名非党员教授举办《宪政问题十讲》，与之对抗。^①联大区党部对左翼激进教授的态度，还算比较克制，未采取过激手段对付。联大教授们的政治倾向虽然日趋分化，但不同政治倾向的教授在联大校园内尚属互相尊重，和平共处。

同年4月下旬，日本发动豫湘桂会战。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联大学生受此刺激，纷纷以纪念“五四”为契机，发泄对政府当局的不满。5月4日前后，联大校园空前热闹，“民主墙”上，墙报琳琅满目。5月4日晚，《文艺》墙报社举行以“五四运动与新文艺”为主题的文艺晚会，邀请了罗常培、闻一多、杨振声、朱自清、李广田、沈从文、冯至、卞之琳等人讲演。由于到会人数太多，会议场地容纳不下，乃改于5月8日晚举行，由国文学会举办，在原请演讲人之外，增加了孙毓棠、闻家驷两位教授。重开的文艺晚会盛况空前，参加者达3000多人。晚会由罗常培、闻一多共同主持。1996年出版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将这场文艺晚会与5月3日历史学会举办的纪念“五四”晚会（有周炳琳、雷海宗、张奚若、闻一多、吴晗等教授讲演），称作战时联大校园新的爱国民主热潮兴起的标志^②。而姚从吾在晚会之后写给朱家骅的报告则称，这场文艺晚会完全是联大区党部有意策划的一次成功化解学生风潮的行动。姚在报告

① 《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44年5月14日）。

② 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第451~452页。

中写道：校内左倾分子“初欲藉救济费太少，激动风潮，志未得逞。嗣又欲因人心浮动，假纪念五四，扩大活动。幸五四天雨，团部、党部又分别防范，虽墙报五光十色，而集会实未举行。延至5月8日，由罗莘田（即罗常培——引注）同志用中国文学系名义，联合八教授，召开一五四新文艺晚会，专以讲述文艺为限。目标转移，人心始复归镇定。八教授中，除闻一多、沈从文、卞之琳三先生外，主席及召集人罗莘田、杨振声、孙毓棠、李广田等均为党员。五四文艺晚会自七时起，至十二时止，参加者逾两千人，实属空前。希望经此一次发泄之后，人心能由此安定下去也。”^①

1944年5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十二中全会。会上，蒋介石让陈果夫取代朱家骅任中央组织部长，旋即又由陈立夫接任。朱家骅则接替陈立夫任教育部长。国民党党务组织大权再次回归CC系之手。在朱家骅任中央组织部长期间，自树一帜，难免侵蚀CC系的地盘。陈立夫重掌组织大权后，势必趁机报复。^②西南联大区党部是朱家骅一手扶植起来的基层党部。因联大在全国大学中之独占鳌头的地位，以及姚从吾与朱家骅之深厚私人交谊，使得西南联大区党部得到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特殊关照。中央拨给联大区党部的经费，远高于其他大学区党部。朱家骅的离任，势必影响联大区党部的活动。姚从吾在联大办团、办党，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朱家骅抬轿子。朱既去职，姚从吾的办党热情也随之锐减。没有中央党部在经费上的特殊津贴，联大区党部的工作也难以继。加之三青团在联大的势力此前因复兴社旧人离校而受到削弱。形势朝着有利于中共和左翼学生运动的方向发展。

① 《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44年5月14日）。

② 参见拙著《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第323页。

学校当局的态度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1944年4月30日，清华大学举行33周年校庆。联大常委蒋梦麟在致词时一再声明“西南联大是中国的民主堡垒”。当时在场的朱自清对蒋梦麟敢说这样的话而深感吃惊。^①在此前后，联大另一常委梅贻琦也私下表示，他对共产主义无大认识，颇表怀疑，但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元培相容并包之态度，以恪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②1944年秋，联大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由三青团转入中共和左翼学生之手^③。

1945年5月，国民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了争夺大会代表席位，CC系与朱家骅系在西南联大展开了一场明争暗斗。在此之前的1942年，河南大学改为国立，朱家骅曾推荐姚从吾任河大校长，被教育部长陈立夫婉拒。姚对CC系难免心存芥蒂。陈立夫转任中央组织部长后，试图将CC系势力打入西南联大。国民党六大召开前夕，CC系笼络联大政治系教授崔书琴，然后以崔书琴为桩脚，发展CC系在西南联大的组织基础。在CC系的经费支持下，崔书琴在联大法学院举办讲演会，每次付给讲演者优厚酬金，以此笼络党员教授。姚从吾对此十分警觉。他告诉朱家骅：CC系想打入联大，不惜运用种种力量，其目的“自然是想另在联大立一‘龙头’”。为了抵制CC系势力的侵入，姚从吾建议朱家骅：由朱家骅以教育部长的名义每学期津贴联大文史讲演会或国际学术研究会七八万元，仍在文、法学院举办讲演会，以资对抗。鉴于CC系每次每人送讲演费4000元，姚从吾建议将讲演费提高到5000元至6000元，每次聚餐15000

① 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10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第289页。

② 黄延复、王小宁整理《梅贻琦日记（1941～1946）》，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第184页。

③ 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编《清华大学校史稿》，第405页。

元。同时编印党员教授讲演集，以此吸引和笼络联大师生。由于朱家骅与学界名流多相往还，姚从吾还建议朱家骅呈请蒋介石，直接圈选一批“名流党员教授”为中委。因CC系与知识界的关系比较疏远，派内的“名流党员教授”不如朱家骅系多。请蒋圈选名流党员为中委，自然对朱家骅系最有利。^①CC系与朱家骅系的争斗，导致联大国民党籍教授群体分裂，进而影响国民党在联大的组织力量和声誉。此一情形在战后教育界一直延存^②，甚至影响一部分英美派知识分子与国民党的背离。

出人意料的是，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撤销军队党部和学校党部。六大决议后不久，全国各学校党部相继关闭。^③西南联大区党部亦不例外。

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继起。当国民党关闭学校党部后，中共在大学的校园的活动日趋活跃。两党在大学的校园的局势迅速发生逆转。过去“以组织对组织”的“文斗”，迅速升级为“以行动对行动”的“武斗”，以至出现“前方打仗，后方打人”的奇特政治景象。因大学区党部不复存在，国民党只能直接藉军警力量震慑学潮。

六 结语

在西南联大，区党部与学校行政当局之间究竟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① 《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45年3月22日）。

② 1948年，有文谈论中央大学教授的派系，内中所提“陈派”即CC系，“少壮派”即朱家骅系。见南京通讯《中央大学的教授们》，载《新路》第1卷第6期，第17页，1948年6月。

③ 《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中央各部会工作报告》，李云汉主编《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组织工作》（下），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93，第569页。

当大学党部刚刚筹设时，教育界即有人担心：“有了学校党务，也许会影响学校行政。”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于1941年3月出台规定：大学区党部书记有权列席校务会议。这是国民党中央对大学党部与学校当局关系之唯一法规。区党部书记仅具“列席”校务会议资格。这意味着国民党中央无意让大学区党部干涉学校行政。事实上，国民党中央从来没有“以党治校”之说。在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是最高行政领导机构，下设校务会议和教授会。校务会议的成员由常务委员、教务长、总务长、训导长、各学院院长以及教授、副教授互选之代表组成。初期每学期举行一次，后改为每学年举行一次，其职权为学校预、决算的审议，学系的设立和废止，学校各项规章制度的颁行，讨论改进校务以及常委会交议的事项等。^①1941年12月，联大区党部选举时，周炳琳与姚从吾的票数相同，但周坚辞不就，姚只好连任书记。周之坚辞，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区党部书记一职，实在无足轻重也。姚从吾当选为联大区党部书记后，按理可以“列席”校务会议，但他让周炳琳、冯友兰代为列席^②，显然对“列席”兴趣不大。周当时是教务长，冯是文学学院院长，两人均是校务会议正式成员，故代为“列席”者，不过名义和形式罢了。

联大由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合成。三校校长组成联大常委。三人均是国民党党员，但张伯苓长期在重庆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蒋梦麟与梅贻琦分别兼任联大区党部监察委员和候补监察委员。校长兼任校党部监察委员，在其他大学也多如此，似是国民党中央的统一部署。按照规定，区党部监察委员的权责是执行党纪，稽核区党部经费的收支，审查区党部的工作。实际上，让校长兼任监察委员，更大的可能是为了便于学校党部与学校行政

① 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第36～37页。

② 《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42年1月21日、2月10日）。

当局之间的沟通和协调。只有个别大学，校长同时兼校党部执行委员。^①

从西南联大的情况看，区党部与学校行政当局之间甚少往来和联系。区党部基本上不参与和干涉学校行政；反之亦然。就组织系统而言，大学区党部直属于国民党中央，只对中央组织部负责，接受中央组织部的指令，定期向中央组织部汇报工作。区党部的经费也由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划拨。学校对区党部没有补助。区党部与学校当局之间亦未发生过磨擦和冲突。只是当党员人数发展到相当规模时，姚从吾担心“召致学校方面与其它方面之嫉忌”，而有自我收缩之意，转而“取保守与稳健态度”^②。外间评论联大区党部与学校当局之间关系冷淡，但也互不干涉，相安无事。

应该说，战时大学党部中，西南联大区党部办得最具声色。此一结论与西南联大“民主堡垒”的称号似乎难相枘凿。其实两者并不矛盾。首先，联大区党部之“最具声色”，乃相对其他大学党部而言。其次，所谓“民主堡垒”实乃联大后期之称号（大体是1944年以后的事，今人大多统称西南联大为“民主堡垒”显然不确），而那时联大区党部即将停闭。

晚年冯友兰对国民党在西南联大的活动有一评价。他说：战时“国民党对于高等院校的直接控制空前地加强了”。在联大公开设立国民党区党部、三青团分团部，出席联大常委会的人都是国民党党员，而且还要受区党部的“协助”，在学校还设有训导处，由训导长负责对学生进行“训导”。“这种公开地以党治校，在中国教育史上还是第一次。”但冯友兰又说：“从表面上看来，

① 《筹备成立中央直属学校党部》，载《中央党务公报》第2卷第37期，1940年9月；《各学校党部执监察委员名单》（1945年夏），朱家骅档案，学校党务卷，卷号：94—（15）。

② 《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44年2月12日）。

联大成为国民党完全统治的学校了，其实并不尽然。据我所知，联大还是照三校原有的传统办事，联大没有因政治的原因聘请或解聘教授；没有因政治的原因录取或开除学生；没有因政治的原因干涉学术工作。所以在当时虽然有这些表面的措施，但社会上仍然认为联大是一个‘民主堡垒’。”^①

事实上，当时人誉西南联大为“民主堡垒”，不完全指其在“民主”方面如何具有声色，在很大程度上乃称许其“宽容”精神。1946年当联大宣布停闭的时候，《观察》杂志专门发表文章，就其“宽容精神”作过如下一番评议：

联大容忍精神最好的表现，就是它包容了各党各派的教授与学生……教授方面，在属于左派政党的教授中，有闻一多和曾昭抡等先生；在民主社会党中，有潘光旦和费孝通等先生；没有党派而批评政府的有张奚若和陈序经等先生；比较中立而对政治常有意见的有陈岱孙和王赓愚等先生；在经济问题方面批评政府的有伍启元、杨西孟、戴世光等先生；属于国民党反对派的有钱端升等先生；属于国民党批评派的有周炳琳、杨振声等先生；国民党开明分子有冯友兰和雷海宗等先生；三青团的有姚从吾和陈雪屏等先生。在联大这许多教授中，有一件可喜的事，就是联大是没有顽固派的分子。不过，如果有极左右的人，联大也必能包容而不加排斥的。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堡垒”，真正的“自由堡垒”。^②

应该说，抗战时期的大学校园，既是国共较量的重要舞台，

^① 冯友兰：《冯友兰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2000，第321～322页。

^② 记者：《西南联大任务完成，化整为零》，《观察》第1卷第6期，1946年10月5日。

也是国民党内不同派系角逐的场所。学界分合的背后，除了政治理念的明争，亦有派系因素的潜存。战时知识界与执政当局的关系，在紧张和对峙的既有认知之外，更有亲近与同情的面向。正是不同党、派知识精英在西南联大的共存和共处，才建构起这座极具包容性的“民主堡垒”。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